

建立前瞻性升级管理机制 更好应对海外风险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张凡

俄乌冲突持续、苏丹爆发内乱……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局势紧张和流行疾病多发的当下,怎样做好功课以判断清楚形势,怎样更好地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成为摆在出海中企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际SOS方面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海外不同国家的社会动荡、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轻微犯罪、道路安全、网络安全等仍然是最可能影响到员工安全的问题。国际SOS全球安全团队密切关注这些风险因素的动态变化,并及时发布相关警报和深度报告。根据国际SOS发布的《2023年度全球风险展望》报告,2023年全球企业机构仍将面临显著风险。专家预测,由诸多风险因素构成的“持续性危机”中的全球商业运营环境,将影响全球企业和员工,并可能会降低企业机构的生产力。

来自该报告的相关预测显示,海外社会动荡将是造成2023年生产力下降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例如,有33%的海外受访者认为当地的局势动荡将影响商务差旅人士。由于海外社会动荡问题的多面性,它将成为2023年全球企业高管关注的主要风险议题之一,并将以多种方式影响企业机构和员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能源和农业市场波动会加剧动荡,对一些不稳定、脆弱的经济体尤甚;海外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或政治问题难以解决,当地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出现抗议骚乱浪潮,而暴力风险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反映到各国国内,在极端情况下,当地或发生更多暴力和犯罪活动。

应对安全风险需路线图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秘书长原越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安全风险主要指的是人员和财产的风险。中企“走出去”不太熟悉境外的法律、人文、社会等各种情形,包括对境外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的预判也不足,所以“走出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事情,大家称之为“交学费”。

有没有办法少“交学费”呢?原越建议出海中企在防范安全风险时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企业要有明确的境外安全策略,不能“裸奔”。有了这个策略以后,还要有一套机制和制度,在组织项下进一步细分,落实为岗位分工和职责。“我们在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看到,有的企业开始在这方面想办法,但是还不够系统。”

第二,有了上述境外安全策略后,要按照PDCA做好提升、完善、再提升的循环。PDCA,即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处理(Act)的首字母组合。

第三,出海中资机构应增强使用专业机构的意识。一方面完善专业机构的配置,另一方面中资机构也要养成多借助专业安保力量支持的习惯。

原越介绍说,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保险经纪业务,境外的人员财产保险也是江泰的专长和长期在做的事情。江泰在帮助中企防范“走出去”风险方面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从2015年开始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面向出海企业和公民,每年以大会的方式告诉大家海外风险有哪些,

并提供一些解决办法,有丰富的内容供企业参考。二是运营优投网,目标是为企业出海寻找各类服务商,包括安全服务商、安保公司,还包括保险机构、银行、律师事务所等;三是创办大救星APP,满足公民在海外的救援预警需求,也可以为企业服务。“同时我们还正在做企业境外安全工作示范方案和境外安全保障工具包。”原越说。

“高水平高质量地‘走出去’,需要匹配高水平安全风险防控的能力和资源,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希望给企业一个可操作的基本路线图。”原越认为,其实中企现在的管理水平很强,不输于境外企业,中企只要重视海外安保事项,坚持去做,很快就可以提高到一定水平。

国际SOS全球安全风险团队也向记者表示,全球企业机构在制定应对措施前,首先要了解风险环境、社会动荡的驱动因素以及最可能对员工和运营造成影响的风险。这也可以帮助企业机构建立正确的早期预警系统,了解潜在的触发因素,以及清楚如何针对各类安全风险问题做出应对。风险意识的培育也是关键。员工和决策者需要了解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风险和保障安全。

更加重视医疗风险预警

除了安全风险,医疗风险也是出海中企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国际SOS方面告诉记者,2020年7月,一名在非洲工作的中企员工出现持续高烧癫痫,生命危急;该非洲国家医疗设施资源匮乏,且传染病风险复杂。另外,适逢新冠疫情高峰,当地医疗资源受到挤兑,而当时

的跨境医疗转运航空运力也非常有限。国际SOS在接到相关请求后,医疗团队第一时间介入管理病例,将患者转移至国际SOS非洲当地诊所检查并提供治疗,确诊其感染恶性疟疾伴有脑并发症。鉴于当地医疗资源匮乏,企业决定将该患者通过医疗专机转运回国。国际SOS拉各斯诊所、巴黎及北京援助中心三方联动,着手执行本次任务,协助企业办理各项医疗包机入境许可要求。历经十余个小时,跨越非、欧、亚三大洲,该患者最终通过医疗包机,顺利平安回到国内,接受后续治疗。

国际SOS方面认为,无论是对于中国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当他们的员工离开自己的国家外派前往异国他乡或者出差,在不熟悉的环境和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员工面临的医疗风险会更复杂。国际SOS全球援助中心每年收到的400多万通援助及咨询电话数据显示,员工在出行期间发生医疗健康事件的比例是安全风险援助事件的7倍。他们认为:

第一,尽管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严重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消退,但其他传染病依然存在,流感、疟疾、登革热、寨卡病毒、埃博拉以及最近出现的马尔堡病毒等,都会对员工健康造成威胁。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也随时会出现新的传染病。

第二,员工面临的海外医疗风险和当地的医疗资源紧密相关,比如周边的医疗机构、医院、诊所的条件是否健全,当地是否能采购到合格正规的药品等。及时获得这些有效的信息非常重要。

第三,外派及差旅员工自身的健康状况,也是必须提前充分考虑的。

另外,除了身体健康,医疗风险也涵盖了心理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外派及差旅员工,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家庭,会使员工感到更多压力和焦虑,而前往偏远地区的员工,这些心理问题更可能会加剧。

对于中企在海外怎样防范医疗风险,国际SOS的建议是:

首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企业管理者要从战略层面,将保护员工身心健康和海外安全作为企业的重要工作,只有从最高管理层到各部门都充分对这一点达成共识,才能更好更切实地推进各项风险防控计划的落实。

其次,企业要有“预防为主、防微杜渐”的意识,要从行前风险意识培训、员工适岗评估、了解目的地风险、应急资源准备、突发事件计划等方面面,夯实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

具体到企业防范风险,无论哪一方面的风险,获取及时、准确、可靠,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并加以分析,是企业对具体事件进行评估和决策的基础。企业还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企业在海外的态势感知,虽然企业很少能够准确预测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也很少有完全没有预兆的事件发生,不管是自然灾害、战争冲突或者是传染病暴发,所以企业需要对可能发生的状况有整体性的、趋势性的预判,建立前瞻性的升级管理机制。另外,是要让风险可处置,也就是针对各种可能性,提前做好预案和内部升级流程,管理者和员工都了解自己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明白可以从哪里获取咨询建议。

投资环境

一季度非洲初创企业 引资规模同比下降42.8%

瑞士媒体非洲财经通讯社报道,经济咨询事务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一季度,非洲初创企业吸引资金总额8.599亿美元,同比下降42.8%。这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出资减少,对不少初创企业造成困难。从国家来看,埃及(4.342亿美元)、南非(2.447亿美元)、尼日利亚(6110万美元)和肯尼亚(4420万美元)四国初创企业共吸引91%的资金。从行业来看,金融科技(5.9亿美元)、卫生(6420万美元)、能源(4740万美元)、电信媒体和娱乐(3860万美元)和交通物流(2490万美元)吸引资金最多。

东南亚汽车业稳步增长

东盟汽车联合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3月,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的汽车销量约86万辆,同比增长4.3%。从生产端看,6个主要国家汽车产量超过116万辆,同比增长8.2%。例如,作为东南亚地区最大汽车市场,印度尼西亚3月汽车销量达10.1万辆,同比增长2.6%,连续10个月呈增长态势。不久前落幕的第四十四届曼谷国际车展吸引了160多万名观众前来观展,汽车预订量达4.5万辆。车展客流量和订单量均超预期,不少新车型受到众多消费者青睐。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地区国家出台更多促进汽车发展的激励措施,产业供应链有所恢复,东南亚汽车业有望持续快速复苏。

中东产油国 非石油经济表现活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中东东北非地区经济仍将保持增长势头,尤其是地区产油国的非石油经济表现活跃,成为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报告指出,去年中东东北地区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3%,今年将减缓至3.1%,明年再小幅提升到3.4%。报告建议产油国谨慎管理石油收入,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能源转型和经济多元化,并进一步推动财税改革。报告发现,总体上,产油国的经济多元化指数处在较后位置,但在中东东北非地区,由于相关国家着力发展非石油经济,其经济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以沙特为例,在“2030愿景”推动下,沙特在旅游、航空、物流、先进制造和高科技领域大量投资。仅旅游业,沙提到2030年就将投资3780亿美元,新增31.5万个酒店房间。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有了这座电站,我们国家将会发展得更好』

■ 颜欢 邢雪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希林市,早晨7时20分。哈桑驾车从市区出发,驶向位于市郊的锡尔河州1500兆瓦燃气电站项目现场。他穿戴好防护装备,根据小组早会布置的工作任务,前往指定地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放线、接线、检查盘柜……作为电站项目综合一组的电力工人,哈桑和3名工友共同负责现场施工点的电力供应工作。“我做这一行14年了。两年前,我来到这个项目工作,技能提升了很多,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我很有信心,以后将继续参与这样高标准的项目建设。”哈桑说。

锡尔河州1500兆瓦燃气电站项目是乌兹别克斯坦以外方投资形式开发的第一个大型燃气发电项目,总占地面积约75公顷,是目前中亚地区最大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由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能建”)总承包建设,预计将于今年底全面投产。电站采用世界上燃烧温度最高、单台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燃气轮机以及“废水零排放”设计标准,与当地同等规模的老电站相比,发电量能翻一番。

在项目北侧,输电变电站已经建成,银色的钢结构输电塔高高耸立,在25公顷的土地上依次铺开,颇为壮观。中国能建的该项目总监陈松银表示,输电变电站于5月开始调试电力入网程序,为8月燃气发电组率先投入使用、向乌国家电网输电做好技术准备。

下午2时,哈桑和3名工友刚完成电缆维修,得知项目西南角的一个管道焊接预制场停电,立即马不停蹄赶往现场。在中方技术管理人员的指导下,他们不到半小时就恢复了管道焊接预制场的电力供应。

“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我能处理的技术问题很有限。来到这个项目后,中方技术专家带着我们系统学习电力维修,一步步上手操作,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哈桑说,现在当地员工和中方技术指导之间沟通顺畅,“中方专家的思路和工作流程特别清晰,我们干起活来效率很高。”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电力的需求加大。作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规划的重要工程,电站全部建成后,每天可向当地电网提供3600万余度电,不仅能惠及乌百万居民,还能更好地助力中亚地区实现电力互联互通。

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部长米尔扎马赫穆多夫表示:“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电厂全面投入运营,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电力产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下午6时,工人们陆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三三两两走出项目现场。沿路上,近百面小彩旗迎风飘扬,提示着确保安全生产、建设质量等内容,映衬着大家的笑脸。“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工作,大家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都很期待把电站尽快建好。”哈桑高兴地说:“有了这座电站,我们国家将会发展得更好。”



近年来,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立足地处中药材适生区地理优势,坚持发展现代生物医药产业,设立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同时在企业人才引进、科技研发、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引导入园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形成产业集群,带动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图为在该县一家中药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药丸流水线上进行生产。

中新社发 黔昶 摄

加大新能源投资 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

■ 本报记者 王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近日,在中国新闻社与能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23年第一期论坛之“能源中国”上,与会专家围绕如何有序推进新能源转型,更好实现“双碳”目标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建议。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能源转型做好“先立”,应立电源、立储能、立电网。立电源要加速发展风光等可再生能源。

“在立储能方面,拥有一个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能源系统,才有可能提供稳定、平稳的能源供给。”邹骥表示,中国在发展储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就是七大流域都有大量水库,依托这些水库做抽水蓄能有很多先天基础条件。

“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有很多思路,建设电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同时也要有体制机制的支撑,要有电力市场化的改革。”邹骥认为,中国要有强大的电网,要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问

题,要能实现省际互通互济。

“可再生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途径,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减碳不减生产力的重要支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委员、总规划师张益国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风电技术可开发量是109亿千瓦,光伏技术可开发量是456亿千瓦,水电技术可开发量是6.87亿千瓦,足够支撑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此外,可再生能源技术及产业基础良好,规模化发展能力较强,202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达到12.13亿千瓦,全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明显。

碳中和目标下的产业投资机会如何?据中金研究院估计,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总绿色投资需求约为139万亿元,平均每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约占GDP总量的2%。据麦肯锡估计,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69个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85%)需要投入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275万亿美元。

“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短期对经济增长会很有帮助,长期会有利于碳中和的转型和全球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称,预计到2050年,中国碳中和累计投资规模约为180万亿元。

朱民认为,碳中和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早期在碳达峰前的投资主要在新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科技创新,这是为未来转型打下基础。例如,在投资新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对电动汽车、5G、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利于推动我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在朱民看来,鉴于碳中和与新能源的投资广度和深度,这需要创新投融资工具来满足需求,也需要对现有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债券市场的发展,比如扩大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朱民表示,碳中和会迎来新的增长模式。在“双碳”目标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会面临巨大的产业结构变化,整个过程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碳排放下降,而GDP会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到2060年,中国的GDP会从现在的100多万亿元涨到400多万亿元规模,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增长。”朱民称,从2020年到

2060年,中国有机会以碳中和为主要抓手来再创辉煌,这是一个从能源到生产、消费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模式变化,这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活动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建议,未来中国应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力促进能源转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有为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和碳市场,并加强两个市场发展的统筹和协调。同时,应加大对集中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积极跟踪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和实施,优化授信流程,强化风险管理。

“政府在这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光靠开发商和金融机构。”叶燕斐表示,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形成规模效应之后,就能把交易成本和技术成本降下来。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敞开胸怀与国际进行合作,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拥抱国外成熟先进技术,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张益国说。